

时代变化与哲学思维方式

王 学 海

时代不同,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哲学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很难用几句话下一个完全而准确的定义。然而,如若从哲学思维的主要特征上说,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它指的是人们追寻具体事物的更深刻、更一般道理的思维方式,即所谓哲理;狭义上,它指的是人们如何考虑主客观之间最一般关系的思维方式,即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本文主要从狭义这个角度分析说明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如何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一)

众所周知,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具有抽象思维,具有一个独特的主观世界,在他行动之前就有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或行动方案。人类一旦脱离单纯动物式的对外界及自身社会的反馈,亦即维持自身生存的觅食、御敌、配偶繁殖等的本能反应后,就在他们的主体自身中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客观外界的主观世界:精神和意识。人们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主观世界,它又成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原则和纲领。我们从这种意义上,人们的主观世界如何将决定他们如何行动,甚至决定他们的行动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主体作用于客体和主观意识与客观实践、知和行的相互影响、不断发展的人类活动史或实践史。

现在,我们就从人类活动史这个角度来考察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如何跟随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对这些变化的详细图式和具体细节加以描述,但是可以从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认识特征上把哲学思维方式概括为四种类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这四种类型并没有把所有思维方式包括进去,它们只是标志人们对一定时代的总体认识特征。第一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为“图腾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原始人对自己周围环境、对自身社会如何延续下去的条件在他们主观世界中逐步产生和形成的某种朦朦胧胧的认识和反思。原始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而进入所谓“人的社会”,他们与动物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们能利用和制造简工具以获取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而也就在他们的主体世界中形成某种高于动物界、但又极其贫乏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原始人类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的条件下,他们必定被牢牢地禁锢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如何又往往决定他们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因此,原始人类对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对他们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某种实物,尤其是食物,把它看作至高无上的东西,把自己的“前途”、“希望”寄托在这些实物或食物上,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中也就逐步形成“图腾崇拜”这种思维方式。

当然，这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是属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但在文明社会中，所谓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也具有“图腾式”的思维方式，因为它也是人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金钱、商品这些实物上。第二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为超自然、超人类的精神力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人们的一定社会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当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也就慢慢懂得“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等极小范围的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但对更大范围的、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因果关系却一无所知，而恰恰是这些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如洪水灾害和战争等，给人类自身带来莫大灾难。当人们目睹这些可怕现象而又无法解释、找不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时，这就会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极度的恐惧和害怕，他们主观上就产生了似是而非的想法，似乎在这些可怕现象后面还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在起作用，因此，他们逐步地把这种不可捕捉、难于理解的力量看作超自然的、超人类的精神力量，进而又把这种精神力量加以人格化就变成神或上帝。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虽然具有强烈的理论和逻辑论证体系，但它的逻辑起点恰恰是对某现象或事物找不到具体解释、不知道它产生的原因而浪漫主义地推到某种超自然、超人类的客观精神动力上。就是在今天，我们对某些问题、尤其是人生问题感到疑惑不解时也往往会归结到不可名状的“命运”的神秘力量上。第三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为主观精神至上的思维方式。它也是人们在这样一个时候产生的，即当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以及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取得巨大进展、人们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时，他们主观上往往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业绩纯粹是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似乎人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面前，人的主观能力是万能的，可以改变一切的，而客观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不过是听人摆布、由人主宰的“奴隶”。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主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力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力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限度。第四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为主客观交互作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的，即当人们的实践活动取得巨大成果而过分夸耀和赞美自己的主观能力时，他们又不知其所以然反被自己所取得的成果或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后果惩罚和支配。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再反思：他们的主观能力到底能发挥到何种程度以及受到什么样的限制。这就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我们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社会领域中也一样，当资产阶级产生和兴起的时候，它的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中，曾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尺度，并要求建立所谓合乎“理性”的国家制度。然而，当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它所建立的国家制度并不是像它先前的思想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合乎“理性”的，这其中的现象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在这种异化过程中，工人认为他的全部努力只是维持生物式存在的手段，而劳动中创造性的部分又与他相异，他的品质和能力和其他商品一样表现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资本家也一样，虽然方式不同，但他成为金钱的化身，而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必须唯市场之命是从，不管自己的意愿如何。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和探讨工作。如新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它们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把物理客体归化为“观念”，认为知道和被知道的关系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关系，物理客体是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但是，这些思潮虽然正确地说明了认识的客观方面，却往往否认了主观世界的能动方面，把认识看成是纯粹的被动感受性，因而在论述主客观的总体关系上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性。与这些思潮相比，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更

全面、更科学地勾划出这个总体图式。它首先把人的思维和意识看作人脑的产物，“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②同时，它又强调人的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反作用，人“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③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思维方式中，它把主客观之间确立为两层的辩证关系：第一层强调物质的根源性和对意识的决定性；第二层强调意识的相对性和对物质的能动性。这就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④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百多年来它又是怎样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这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实践和人们的认识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变化，因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⑤但是，我们认为，这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总体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它的具体思维方式却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实践需要而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具体地分析这种变与不变的情况。

我们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恰恰是这百多年来的人类社会实践和人们的认识发展并没有导致人们否认和推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总体图式，也没有发现或找到别的什么图式来代替它。无疑，这百多年来的客观实际的巨大变化给予人们的思想于强烈的影响，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生物工程、计算机系统和智能机器等的出现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这些都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强烈注意。例如，现代西方各哲学流派和不同的哲学家，尽管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代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科学主义思潮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典范，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准绳，科学在他们心目中已成为宗教般神圣的东西，而人的其余一切，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不属于真假判断的事实问题，因而不是“科学”的问题，它们不过是抒发人的感情的“情感论”而已。同样，作为反科学主义的存在主义从另一个角度强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否定了个人的价值，吞没了个人的“存在”，因为，技术的发展使人处于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群集形式的存在中，人既然生存于群集中，因此他就不是他自己，使他丧失了自我。科学自身无法告诉人关于“人的问题”的任何东西，凡想从科学中寻找自己生活依据和行动指南的人都将会失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把它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本人甚至把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体现，即工具看作是衡量时代的重要标志。我们今天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我国四化建设的关键之一，其道理亦是如此。从我们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百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予人们的思想于极大影响，但这种影响至多也不过是导致人们对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前景产生不同估价罢了，他们并没有认为人的主观精神可以违背客观规律、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主客观之间的总体关系颠倒过来。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图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我们从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上看，它的具体思维又是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变化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他们根据当时人们的社会实践发展以及吸收前人研究的理论成果创立了他们的哲学总体图式，即一般地勾划出主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们的具体思维方式却侧重于强调思维和意识的物质性方面，“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

头脑并在人的头脑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⑥而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虽然历史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创造的，但历史的进程却是由社会的物质基础、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发展决定的。他们的具体思维方式所以侧重于强调意识的物质性方面，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支配人们主观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由各种唯心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把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某种精神力量上。因此，在他们看来，强调意识的物质性就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主要哲学任务。恩格斯曾说，他们常常不得不强调这个主要原则，而且他们并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给其他因素以应有的注意，他们必须首先把主客观之间被颠倒了的关系颠倒过来。接着，在列宁的时代，他在阐述他的哲学思想时明确指出他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路线的。但是，我们从他的大量哲学论著中可以看到，他的具体思维方式侧是强调哲学的党性问题，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⑦现代西方的评论家也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大都是评击对党具有危险性的一种观点。”^⑧列宁在他的具体思维方式中为什么把哲学的党性问题特别突出起来呢？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和实际情势就知道这一点了。一方面，列宁当时所在的俄国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前夜，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又发生了用什么思想路线指导革命问题的争论；另一方面，当时的自然科学也处在所谓“物理学危机”、“物质消失了”的时期。因此，在列宁看来，他当时的哲学任务除了坚持和进一步推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外，如他把精神和意识表述为对客观实在的近似的模写或复写以及他对物质概念下了一个定义等，但他主要是考虑哲学思想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哲学路线，这是关系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问题，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必须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他所从事的事业跟他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而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表现着敌对的阶级倾向和思想体系，“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⑨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列宁的具体思维方式特别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摆在一个突出的地位。

最后，我们就来看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我们根据他的大量著作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具体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哲学”图式，即把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上去的思维方式。他说，“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⑩他所以形成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时势决定的。中国自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便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繁纷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出路何在已成为觉悟了的中国先进人物苦苦思索的问题，他们许多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⑪而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使中国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条条框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⑫这就是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可靠的现成的真理，但问题不在于有了这样的真理，而在于如何把这个真理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去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或应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毛泽东同志的思维方式的^⑬主要特征，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无非是说明两个意思，一是说，凡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思想，也许有许多差别和不同，但它们在根本点或总体图式上是共同的，否则就很难说它们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范畴了；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封闭在某种具体思维模式中，任何具体思想模式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三)

今天，我国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我们面临新的理论任务。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几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每人都身历其境，深深感到时代步伐在飞速向前迈进。时代的变化必然要在我们每人头脑中产生某种反响，那是因为，我们的四化建设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改变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那么，我们今天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方式。

所谓实事求是，它自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范畴。但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解放思想，这恰恰是我们时代赋予它的特征。因为，我国自五十年代末以来，一种“左”的、超越客观实际的思维方式逐步支配着我们的头脑，尤其是十年文化革命，林彪、“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死死地封闭在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半步，胡说“宁要社会主义的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我们要搞四化建设，不解放思想，不冲破左的束缚、不打粹彪林、草，“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四化就根本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⑬当然，解放思想绝不是什么“自由化”，它只是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在“左”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模式中，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情况着眼，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解放思想必然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对。要求所谓“绝对自由”，那就难免陷入无政府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坑，成为四化建设的绊脚石。同样，我们不解放思想，一切按照老框框、搬老条条，当然也谈不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四化建设。

那么，我们哲学理论界应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式呢？这个问题，对哲学界来说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它跟其他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的确，过去“左”的和“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给以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混乱，加之我们一些人接触到现代西方哲学，如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等，他们内心就似乎很有点不以为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非就是那么“几条”，与西方哲学比较起来也不那么“科学”，他们甚至认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彻底”改造。我们认为，这些想法固然有合理因素，但不免有些过于偏激。别的且不说，我们就从大家易于接受的科学方法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般地说，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的理论构成总是先从几个基本术语或原始词项以及它们的定义，再加上几条原则或公理公设出发，然后从这里逻辑上一步步地推导出一个完整而有机的体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理化系统。例如，被人们作为典范称赞的欧氏几何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即先从点、线、面等基本术语及其定义，再加上五条公设或公理出发，然后推导出新的定理和定义，并一步步这样推导下去而形成有机整体的欧氏几何的科学体系。同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我们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意识、矛盾、运动等基本术语及其含义，不能推翻物质

决定意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等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就谈不到“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至多也只能说我们怎样调整它内部的结构使之更合理化。当然，欧氏几何后来演化出非欧几何，牛顿力学发展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恰恰是非欧几何“彻底”改变了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即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与此直线平行的直线，爱因斯坦“彻底”改变了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能否做到这点呢？大概是做不到吧！而且，即使像欧氏几何演化出非欧几何，这也并不能说欧氏几何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因为就它所反映的客观空间关系这方面（平面）尽管也是相对的，但我们应当承认它是正确的、科学的，相对之中有绝对。所以，任何理论体系要不要改造或是不是科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践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的哲学理论界仍有一些同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神圣不可触动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否认马克思主义可以吸收某些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他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或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哲学”，现代西方世界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等等。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无论如何都是太笼统、太含糊其词的，难道说科学技术与哲学研究完全割裂的吗？而且把具体的哲学理论一下子拔高到阶级政治利益上评价，这很难使人信服。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⑭例如，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他在论述主客观的同一性问题上从外界的刺激与主体动作的相互关系上来说明主体自身的结构如何同化外界的刺激而重构自身的结构进而以顺应环境，并以这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过程来说明人的意识是怎样产生和进化的、人的主观思维规律如何与客观过程具有同一性的，这些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反映与被反映的机制完全可以加以借鉴的。同样，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关于如何定义术语概念的问题，虽然他过分强调主观感觉的效果和直观描述的作用，但在我们定义某个术语概念时也可以吸收它的合理因素的。

总之，我们哲学理论界应该根据我国今天的时代特点，坚持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式，凡符合当前实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都要坚持，反之，过时了的就不能死抱不放。同时只有科学地概括当前人类实践的发展和吸收一切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7页；74页；457页；第一卷，43—44页；第四卷，224页第二卷，217页。

⑦⑧ 《列宁选集》，第二卷，342页；第二卷，1页。

⑨ 《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67年纽约英文版，第1—2册，395页。

⑩⑪⑫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袖珍本），722—773页；1361页；1404页。

⑬⑭ 《邓小平文选》，133页；167页。